

《三希堂法帖》书家标题考述

张多强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三希堂法帖》楷书书家标题的研究,明确了其内容及设计形式,并通过对主持法帖编纂者:梁诗正、汪由敦、嵇璜等人书法遗迹的考述,进一步廓清了《三希堂法帖》楷书书家标题为梁诗正题写,这一成果拓展了《三希堂法帖》研究的新领域。

关键词: 《三希堂法帖》; 书家标题; 梁诗正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12)04-0021-03

历代丛帖的编刻,皆受到当时诸多背景条件制约,因此其标题书写形式不尽相同,其中书家标题是法帖编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许多与当时刊刻有密切联系的信息,这在《三希堂法帖》中体现的尤为充分。

(一) 书家标题的内容形式

在历代选刻的丛帖中,每个书法作品之前皆题署书家名字,但不同的丛帖所题署的样式字体大不一样。如《淳化阁帖》中题书家名字,以称呼其人时前加朝代和官职的形式为多,如“晋丞相王导”。但在有些卷册中,选编书家作品及定其名目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表现出了较大的随意性。如在朝代和官职后还加上书家地望,如“晋太傅陈郡谢安”,陈郡为谢安的籍贯;有时称官职不讲究,如“梁特进沈约”,《梁书》谓沈约暮年,“加特进光禄侍中,少傅如故”^①,“特进”有特殊使恩之意,而特进的职衔很多,如《梁书》中“特进金紫光禄大夫”、“特进光禄大夫”等,也就是说“特进”之后有不同的内容,故只用“特进”来代表其官职不太考究;有时还只加朝代不称官职,如“梁箫子云”,《梁书》谓箫官“至侍中、国子祭酒,名声颇重”,^②显然非无官者可比;另外,还有连朝代也不加注明的,如“蔡琰书”、“张旭书”等。至于“何氏书”只记其姓、“古人法帖”姓名全无,为

无奈之举,可以谅解。其后以《淳化阁帖》为祖本进行摹刻较为有名的如《谭帖》、《绛帖》等,无不完全照搬,直至到《大观帖》出现,才使这种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观。

《大观帖》对《淳化阁帖》中不加官职者大都加上职衔,如“梁箫子云书”,改为“梁侍中箫子云书”等,书家标题显得比较整齐。但还是有不一致者,如“历代诸家古法帖第五”中有“张旭书”等不加朝代官职,显得孤立不整齐。明代《东书堂法帖》第一、二两卷是帝王书,前面冠之帝王谥号,其余“历代名臣书”,则只署朝代书家名字。且只在每一个朝代的第一个人前冠某朝,之后同朝者不再冠之,表现在书家名前还是加上了官职或号,如“元学士赵孟頫书”、“元句曲外史张雨书”等,当然也有漏书者,如明宋克之书,只有作品,而没有标题,这当是疏忽所至。清《懋勤殿法帖》只署书家姓名,朝代及官职一概不加,表现的最为明快简捷。《三希堂法帖》在标署书家朝代上,既借鉴了以往丛帖标署方式,同时亦有创新,即在一个朝代的每一位书家上面,均加以朝代名称。综合观之,署书家官职有些繁杂,只署书家姓名又略显单调,比较而言,采取划清时代标署名字的方法,应当说是既简便又科学的。

(二) 书家标题为一人所书

在《三希堂法帖》中,楷书书家标题共有 147 处,其中包括数次题写一位书家者。这些书家的姓名都是用正楷书写而成,从这些题写书家姓名的笔迹上看,风格较为统一,相互之间差别较小,其中数字重复多次出现,如出一辙。现就其书写者相关问题论说如下:

首先,在《三希堂法帖》楷书标题中,每一标题首字均为书家所在朝代,如:“唐颜真卿书”、

① 《梁书·列传第七》卷 13,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235 页。

② 《梁书·列传第二十九》卷 35,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515 页。

收稿日期: 2012-05-01

作者简介: 张多强(1973-),吉林永吉人,北华大学文学院讲师,吉林大学书法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古代书画艺术文献。

“宋苏轼书”、“元张雨书”、“明吴宽书”等，我们通过分析同一朝代标题首字的书写特征，来确定某一朝代楷书标题书写情况。如晋代书家标题共有四条，其中四个“晋”字，笔法相同、结体一致，为一人书写无疑。唐代书家标题共九条，其中九个“唐”字，结体相同，惟有“唐”字左侧撇画，或撇出，或撇至末端收笔，以示彼此有别，亦可断为一人所书。宋代书家标题帖中最多，所书“宋”字可分为两类。其一，“宋”字下部“木”字之撇、捺左右写出，开阔舒展；其二，“宋”字下部“木”字之撇、捺作两点，取收敛之笔意。标题中前者居绝大多数，后者仅有“宋富弼书”、“宋朱敦儒”两条。可见宋代书家标题也为一人书写。其后元代书家标题之“元”字，从其笔法、结体看，均为一人所书。明代书家标题之“明”字，惟其左侧“日”字中或作一横，或作两横，以其避免雷同，而其书写特征明显，乃一人所为。

其次，在《三希堂法帖》的每一书家标题中均有“书”字，不难看出其笔法规律性较强，轻重提按明显，转折处顿挫有致，不失方整矩度，其书写风格甚似。惟其诸“书”字中，其下部“曰”字中间横画，时有点、横之别，实乃有意变化为之。

再次，《三希堂法帖》楷书标题的书家姓名中，有较多的重复字，通过对其书法特征的比较，亦可获得些许消息。如在标题中出现了16个“王”字，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到明代王孟端，其间唐、宋、元诸代书家标题中均有“王”字体现，因此关于楷书标题中出现的“王”字书法风格的判断，对于确认楷书标题为一人所为较有价值。楷书书家标题中的“王”字其用笔清健，结体略扁，“王”字三横中前两横较短，且长度近似，第三横较长，大有托起之势，这种结构方式，使得整个字重心较低，稳健有余。统观诸字，其书写特征一致，显而易见。实为一人手笔。此外，在标题中亦有6个“之”字出现，其共有特征为末笔捺画尤为舒展，以托起之笔势为之，其视觉效果可与“王”字同观。标题中有些字结体特殊，且重复出现。如“庭”字在标题中共出现两次，其一为“宋黄庭坚”标题，其二为“金王庭筠”标题。可见《三希堂法帖》中的楷书标题为一人所书，当属确论。

（三）书家标题书者考

明确了楷书标题为一人所书后，其书写者为何人便自然进入了我们的思维视角，历代官刻帖其标题多为主持编纂者所为。《淳化阁帖》由当时的翰林侍书王著选摹，王著的书法颇有时名，被誉为“小王书”，其所书《淳化阁帖》中的卷首大标题及书家小标题，书法水平颇高，得到了世人的公认。《大观帖》是由蔡京、刘焘、龙大渊等人主持选编，陈思《宝刻丛编》云：“大观初，徽宗视《淳化阁帖》

板已皴裂，而王著一时标题多误，临摹或失真。诏出墨迹更定汇次，订其笔意，仍俾蔡京书签及卷首，刊石太清楼下。”^①由此可知帖中标题皆由蔡京书写，蔡京之书，取法欧、米，险劲斜欹，少庙堂之气，从《大观帖》标题字看，书法水平较高，然标题字形偏小，笔意倾斜过甚，再加之所占空间很小，所以显得偏狭小气，与内容不太协调。在《三希堂法帖》“排类”四人中除蒋溥精于丹青外，其余梁、汪、稽三人均善书，其书法风格各异，差别明显。

梁诗正，字养仲，号芑林，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授编修，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太子太傅。梁诗正书法《石渠宝笈》多有记载：如“余省《群鱼戏荷图》后御题诗……乾隆壬戌夏六月御题，臣梁诗正敬书。”^②又，《石渠宝笈》卷41记载：“郎世宁《写生一册》，御题诗云：伯乐今难遇，谁空冀北群，……余十一幅，任兰枝、蒋溥、梁诗正、汪由敦、……诸臣题句，皆梁诗正书，末幅款云：乾隆六年夏六月臣梁诗正奉敕敬书。”^③关于梁氏书法的师承，《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曰：“公书初学柳诚悬，继参文、赵，晚师颜、李。”^④可见梁诗正之书溶颜真卿、赵子昂于一体，筋骨血肉具备，颇具中和之美。

汪由敦，初名汪良金，字师茗，号谦堂，又号松泉居士。安徽休宁人。雍正二年进士，改庶吉士，累官至吏部尚书、军机大臣，谥文端。汪氏如同梁诗正一样，也是一位难得的朝廷重臣。马宗霍《书林藻鉴》云：“由敦书法力追晋唐大家，并工篆隶。”^⑤汪氏善书，故经常奉敕作书勒石，《国朝宫史》卷36载：“命尚书臣汪由敦书诗，乾隆十一年勒石。”^⑥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汪由敦去逝的当年，乾隆帝下旨将收藏在宫廷里的汪氏书法，刻成《时晴斋法帖》10卷以便流传。在乾隆时期，朝廷大臣书法得以在内廷刻帖的，只有张照、汪由敦等几个心腹重臣，不难看出汪由敦书法在宫廷中是很有影响的。现在还能看到不少汪氏书作，其楷书从欧阳询化出，亦受赵子昂、董其昌等人影响，汪书点画厚重，结构整饬，法度森严，优美大方，很具功力。

嵇璜，字尚佐，字甫庭，晚号拙修，江苏无锡人，河道总督嵇曾筠之子。雍正八年进士，礼部尚书，卒赠太子太师，谥文恭。其继承父志重视水利，是清代著名水利专家，有《治河年谱》传世。嵇璜

①陈思《宝刻丛编》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

②《石渠宝笈》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页。

③《石渠宝笈》卷41，第572、573页。

④《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3，清光绪刻本。

⑤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页。

⑥《国朝宫史》卷36，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88页。

工书法，清阮元称：“曾乞嵇文恭公写楹联，至今刊悬，如以古贤，余尝谓嵇文恭公字体出于唐碑，刘文清公出于晋帖，而世人多不悟也”^①。今可见嵇氏楷书《赐宴联句诗》，确实如阮元所说嵇氏书法出于唐碑，以欧、褚之法颇多，方正端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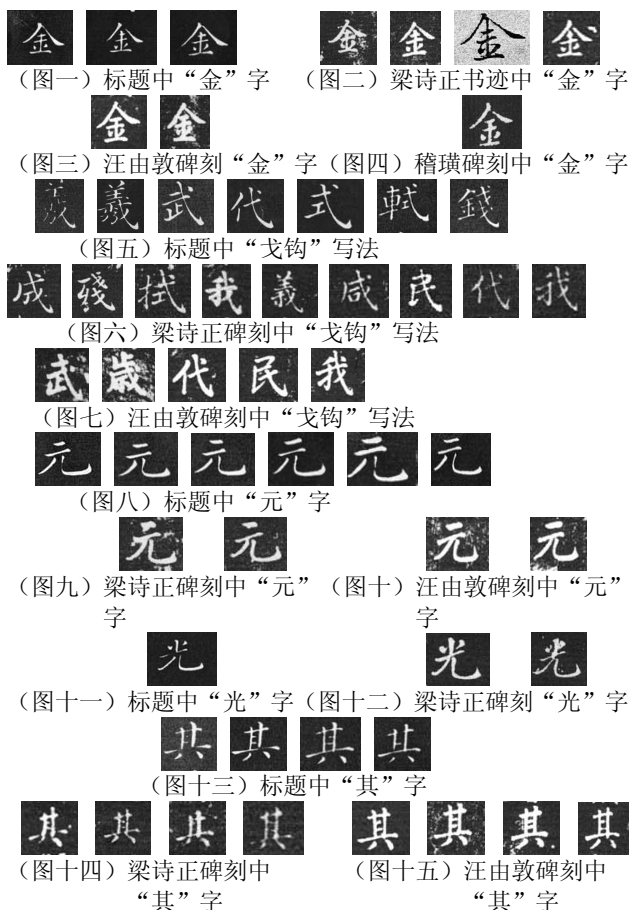
我们择取楷书标题中的部分文字与三人碑刻中的相关文字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推断楷书标题的书写者。在《三希堂法帖》的楷书标题中出现三次“金”字，其书写特征较为明显，即该字下部中间竖画向上与首横相交，且突破横画之上（见图一），这一“金”字的书写特征在梁诗正的传世碑刻、墨迹中多有体现（见图二）。如图所示“金”字的这一特征在梁氏的《玉翁诗刻》、《钟楼碑记》、《万寿寺碑》、《双钟祠诗碑》四通碑刻中均有刊刻，可见梁诗正“金”字的这一写法绝非偶然为之，乃是其习惯字法，且四通碑刻的时间跨度从乾隆五年到乾隆十六年，而这期间正是《三希堂法帖》编刻的时段。此外，在梁氏《快雪时晴帖》题跋的墨迹中“金”字的这一写法亦有体现。于此比观，在汪由敦、稽璜的传世碑刻中亦有“金”字（见图三、图四），汪、稽二人的“金”字写法与标题及梁诗正写法有别，其竖画与首横相接，未突破横画。从“金”字的写法而论，楷书标题为梁诗正所书可能性极大。

我们还可以将楷书标题中部分汉字笔画与梁、汪等碑刻中相关汉字笔画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异同，进一步推断楷书标题的书写者。在楷书标题中有些汉字的“戈钩”书写特点明显（见图五），其“戈钩”笔意纵长，用笔富于变化，起笔略重，继之渐提，笔行至末端欲钩处重按后钩出。楷书标题中“戈钩”的书写特点在梁诗正传世的书迹中亦有体现（见图六），图中所示诸字的“戈钩”笔势纵逸，舒展有余，用笔多有变化，提按顿挫有致。二者相较如出一辙。在传世的汪由敦碑刻中其“戈钩”亦特点鲜明（见图七），汪氏“戈钩”用笔均匀，少提按变化，丰美有余而骨力不足。

此外，从汉字结体特点入手，将楷书标题用字、梁、汪等传世碑刻用字加以比较，从而进一步明晰楷书标题的书写者。如“元”字，在法帖标题中，其下部分撇画与竖弯钩左右分张开阔（见图八），如图所示，“元”字的这一特点在梁诗正的碑刻中亦有充分体现（见图九）。与此相比，在汪由敦所书的《耶律楚材碑》中“元”字的结体则尤显方整（见图十），较之前者差异明显。法帖楷书标题中“光”字（见图十一）结体与“元”字相类，二者亦可同观。梁诗正《玉翁诗刻》之“光”字（见图十二）与楷书标题“光”字比较，极为相似，其结体上紧下舒，下部分撇与竖弯钩有意呈开阔之势。

再如“其”字，在楷书标题中其写法（见图十三），“其”字在梁诗正、汪由敦传世碑刻的写法（见图十四、图十五），三者比观，标题所刻“其”字与梁诗正所书之“其”字笔法、结体甚似，鲁公早年楷书之遗风着实可见，而汪由敦所书“其”字与前者差异较大。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认为《三希堂法帖》的楷书标题必为梁诗正所书。

梁诗正作为朝中重臣，其参与朝廷碑刻书写当不止于此，对此文献亦多有记载。《国朝宫史》称：“皇上赐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诸臣宴于乾清宫，用柏梁体联句，御制诗文，亲书成帙，命侍郎臣梁诗正书诗，乾隆三年勒石。”^②又，“御制序文，亲书成帙，命尚书臣梁诗正书诗，乾隆九年勒石。”^③可见梁诗正作为皇帝身边深受宠爱的翰墨近臣，曾多次为乾隆亲点书写碑石，其法书遗迹留存于宫中大内的必不在少数，这也为我们研究清代前期书法史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



(责任编辑：闫丽)

①梁章钜《吉安室书录》卷8，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

②《国朝宫史》卷36，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86页。

③《国朝宫史》卷36，第687页。